

分析矛盾、驾驭矛盾是我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游敏

当前,我们重视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归根结底是为推进我国经济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服务的,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和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成果,也要反思其陷入“黑板经济学”,导致金融危机的理论根源,从中吸取教训。同时,更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从矛盾分析入手,给予有的放矢的扬弃,处理好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丰富的经济实践至今却未能在理论方面自圆其说。究其原因,一方面与经济学领域理论创新忽视了解证法,忽略了矛盾分析的方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经济学界多年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灌输和主导,在开展理论创新方面,虽然有事实,有依据,有很好的出发点,但是缺乏逻辑基础,被西方经济学在概念、公理、逻辑上捆住手脚有根本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客观分析的一样,我们不仅要研究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更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当前,我们重视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归根结底是为推进我国经济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服务的,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和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成果,也要反思其陷入“黑板经济学”,导致金融危机的理论根源,从中吸取教训。同时,更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从矛盾分析入手,给予有的放矢的扬弃,处理好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

一、西方经济学理论面临的实际困境和本质原因

从亚当斯密至今,西方经济学理论取得的巨大成就,众所周知,应该给予充分的肯

定。但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现有的经济学是一个飘在空中的理论体系,它与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联系甚微**”,这也与二十一世纪初法国发起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如出一辙,他们也曾提出新古典经济学“自我封闭,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社会相互作用,专注与数学幻想”、“它造就了技巧上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但这些经济学家无视社会学、历史和本学科发展的基本事实”。西方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如果从社会行政层面上讲,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英国女王伊丽沙白二世到访伦敦经济学院,向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人意识到危机的到来?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召集顶尖专家给予的答复是:有一件事每个人都忽视了,那就是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但是如果我们从理论的深层次也即从决定和构建人类理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逻辑学的角度来分析,则它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在逻辑上盲目崇信形式逻辑、无法容纳矛盾,相信依据信息不完备的公理、假设和抽象的数学与形式逻辑推理更有根本的关系。“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道德经》第三十二章)。古哲老子的这几句话实际上已深刻地从逻辑学的角度指出了凡是为了人类自身方便而制定的名词概念,由于其本身已经加入了人的主观定义等抽象的同一性因素,因此其使用范围必然是有限、有条件的。因此,使用其构筑的理论就必然受应用范畴、自身条件的限制。所以就必须联系自身的实际,这也是我们学习、借鉴西方理论必须清醒把握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基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各国经济体在新自由主义、无锚货币的主导下,运行方式日趋复杂,同时经济学理论中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人的所谓理性预期、逆向选择、流动性陷阱等主观能动因素,使得各国经济领域面临诸多矛盾的困扰和不确定性。也即被西方学术界称之为非理性、非逻辑、非线性的难题越来越多。因此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揭示矛盾、分析矛盾,提出解决矛盾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无疑是当下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实践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二、经济学理论与实践领域的有关矛盾分析

1、杠杆率与经济增长的矛盾:杠杆率就是债务与GDP之比,加杠杆表现为企业或者政府可以通过贷款、举债来促经济增长。通过这些手段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是

毋庸置疑的。但是能否认为杠杆率越高,经济增长越好呢?显然不是。过度负债,过度使用杠杆本身就是两次金融大危机根本原因。因此,现实的经济体都必然是杠杆率加到一定的程度,就难免脱离了经济基本面的实际,反而陷入经济发展发发可危,而不得不去杠杆困局。于是就出现了杠杆与增长的矛盾。就当前我国经济“三去一降一补”的现实而论,去杠杆途径似乎有三:第一,可以选择促进GDP增长,不断增大杠杆率的分母。但是,在目前经济换挡下行阶段,通过促进GDP增长来去杠杆,似与大势不符。因此如何既促进GDP增长,同时又减少债务呢,显然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两难问题。第二,维持适度的通货膨胀。这也是当前为了防止通缩,政府或多或少为了维持房地产价格,担心银行出现大规模坏账的原因。应该讲通货膨胀能够起到稀释债务的作用,使债务价值下降。但是,一方面,通货膨胀需要特定的经济发展背景和条件,在宏观经济趋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可能如意地长期维持通胀水平。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客观上也存在创造更多债务的副作用,引发房地产热卷土重来。这方面证之日本20余年“搞通货膨胀”而不得的痛苦历程,我们在这里似乎又遇到了一个矛盾问题。第三就是通过减少债务来去杠杆。减少债务的主要方式是出售资产来用以偿还债务。从局部的某个企业或者行业来讲这听起来是非常合乎逻辑,也很理性的。但是,一旦所有的企业、行业或者个人都开始出售资产去还债的时候,资产价格就会骤降,甚至使资产市场出现“去功能化”而陷入了经济学里著名的“集合谬误”。

综上所述,我们的经济体似乎跳来跳去,都跳不出如来佛的“矛盾”法掌。特别在我国,由于我们的经济增长基本是投资债务引导型的,因此,要想促进经济增长,就须增加贷款,增加赤字,而无论是贷款增加还是赤字增加,都是杠杆率的上升。因此,杆杆的使用显然是一个两难问题,需要我们在增加债务和保持经济稳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显然是对我们智慧的极大考验,也是对经济学开展理论创新的急切呼唤。

2、通胀与滞胀背后的矛盾:控制通货膨胀历来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到现在为止,世界上主要的国家都是以控制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

这方面西方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斯曲线也形象地告诉人们经济通胀与失业率成反比,也即在失业率高时,可以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解决。但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到上世纪70年代前后又出现与之相矛盾的滞胀现象呢?也即积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失效,不仅维持不了经济增长,连就业问题

也每况愈下。于是反凯恩斯主义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抬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华盛顿共识甚嚣尘上,但新自由主义实施的结果却是从拉美危机到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可见西方经济学理论由于容纳不了矛盾,非此即彼,最后经济运行必然都以矛盾激化的形式——经济危机而告终。

3、负利率政策凸显出全球经济体的系统性矛盾:当前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全球经济正面对着一个千年之大变局,原因是国内、国外在经济与金融等领域都遇到一系列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件,其中国际上一些经济体,如欧盟、日本、瑞典、丹麦、瑞士等实施负利率政策就是一个突出问题。

从经济学理论来讲,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它与市场上的货币数量有关。实施负利率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企业和家庭的储蓄意愿,增加消费、贷款或投资意愿,从而达到实现通货膨胀目标,抵消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危害。同时也有利于阻止外国资本流入,避免本国货币升值等的目的。最近,美联储也已放出风声,将把负利率作为今后经济的储备政策之一。针对这一趋势,我们将之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情况相比,就会觉得亦非所思。一个很鲜明的结论就是货币政策竟然截然相反,彼此矛盾,也即正负利率都能有助于解决经济的增长问题。这就似乎应了“物极必反和过中则反”这个中国式的规律。

美国上世纪70年代前后曾经由于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以应对经济增长困境,一度大量增发货币,导致物价增加很快,黄金价格从1971年1盎司35美元增加到1980年850美元,增加了24倍多,等于平均每年增加42.5%。这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美国央行制定的目标基准利率一度数年高达15—20%。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几轮的货币量化宽松,结果却是经济整体上出现通缩,以至于可能像欧盟和日本那样出台负利率这样当年根本不可思议的货币政策。那么为什么经济领域的货币政策过了四十多年会出现这种南辕北辙、截然相反的矛盾现象呢?

原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背离是其最大特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终结了固定汇率制,各国纷纷实行浮动汇率,这给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了机会,使之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创新最为活跃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全球商品、金融交易中心、定价中心,其金融衍生品交易规模占全球份额近40%,这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收益。但是由于虚拟经济过于泡沫化,货币资金现在更多地被用于延续债务、影子银行经营、修复资产负债表和推高房地产价格上。因此,超发的货

币不仅没有形成对商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也没有用于真实的财富创造,乃至出现了物价指数并没有走高但经济却不断地减速下行的现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虚拟资本由于需要利润来维持其运行,因此造成财产性收入远高于工资性收入,也即以钱生钱的钱与以钱购买必需品的钱出现严重失衡。根据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提供的数据,到了2010年,美国国民收入的93%流入了占人口1%的最富有美国人的手中,同时自1988年以来,美国家庭平均收入一直停滞不前。这实际上具体地说明了现实中追逐利润的资金与购买商品并贡献利润的资金出现越来越严重失衡。虚拟金融市场已经构成自身的循环体系,一再量化宽松的钱和负利率释放出的流动性绝大部分实际都跑到金融市场,以至于实体经济难以从根本上激发活力,致使美国这样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出现巨大的贸易逆差。

综上所述,负利率政策实际上是金融行业从服务实体模式向金融自身交易模式转变的生动体现,也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出现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它从全球经济的宏观层面深刻地揭示了全球货币、汇率、大宗商品交易等金融体系与全球实体经济以及金融资本主义国家与新兴发展国家和未发达国家内在的矛盾冲突。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负利率政策的实施也会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影响,如政府的国债收益率出现负值,使得民众和企业高管日益对国家经济失去信心,进而使政府以财政刺激经济的政策可能失效。负利率也可能导致人们产生利率上升而债券价格下降的预期,导致货币需求弹性变大,即市场增加多少货币,都可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进而陷入流动性陷阱。同时,负利率政策及大规模购买政府债券还会导致人为压低主权债券的利差,进而削弱市场纪律,并诱发毫无意义的汇率战。现实中负利率在瑞士、丹麦、瑞典等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瑞典最终出现不可持续的资产泡沫,因为该国的负利率政策已经推高了消费价格,导致房价上涨过快,家庭债务高企。

负利率政策实际上也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变种,它正深刻地说明全球央行已经缺少对抗经济低迷的传统工具,陷入了货币政策工具枯竭的困境。面对流动性陷阱,一些国家和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致使促进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正沦为纯粹的金融注水游戏。因此,它只能在时间上缓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内在矛盾,而难以化解最终必然酿成的危机。当前作为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大国,这就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问题。

下转 02

在人们担忧中国银行业风险之际,上海地区不良贷款率连续8个月下降,远远低于全国商业银行的不良率。

上海银行业可为中国改革提供示范

廖岷 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局长

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仅增加5.6%,远低于全国10%的平均增幅。此外,上海私人投资增长率也高于全国水平。

中国正在进行经济转型,从由出口、资本密集型产业、国企和地方政府驱动的增长模式过渡到更多由市场力量、消费、服务和创新型私人企业驱动的增长模式。上海在起着带头作用。银行的资产组合就反映了这一点。

不过,单靠好天气不能保证就有好收成。上海贷款质量良好,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功于银行监管部门自2011年以来针对信贷风险采取的前瞻式监管。

在2011年,先期预警指标提供了上海钢材贸易行业严重负债过度的确凿证据。监管机构发现了来自仓库的虚假仓单;贸易商悄悄把存放在仓库里的同一批钢材抵押给多家贷款机构;贸易商之间互为担保,以增加借款;贸易商把表面上要购买钢材的银行贷款用于投资房地产;还有其他一些把戏。

对监管机构而言,过度放贷和钢价高企两相叠加是极其令人担忧的:当钢材市场不可避免地随着经济放缓而下滑时,由此产生的恶性循环可能引发一场金融雪崩。

中国银监会(CBRC)上海监管局在音乐停

下来之前就采取了行动。上海银监局就对钢贸商放贷问题向银行发出警告,并打击了与钢铁贷款狂潮相关的非法与不审慎做法。结果是,上海银行业对钢贸商的贷款从2011年的2200亿元人民币降到214亿元人民币。在贷款减少额中,1500亿元人民币是因为贷款回收或重组,而变为不良贷款的仅为486亿元人民币。

更重要的是,银行工作人员从鲁莽放贷中吸取了教训。上海银行业没有从未来预支利润,而是提前为未来困境做好了准备。

然而,上海银行业仍有一个致命的薄弱环节:对房地产领域贷款太多,以及房地产价格高企。今年2月,中国住宅价格涨幅为近两年来最快。上海新房价格涨幅全国第二,仅次于深圳,平均价格同比上涨20.6%。

为防范信贷风险并抑制房地产市场,上海在3月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在新规下,已有住房者在申请住房抵押贷款时,须缴纳50%的首付款,高于此前的40%。对于大户型或豪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70%。这种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有利于银行拥有充足的缓冲来应对房地产价格变化。简言之,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需要在问题开始之前介入。不然,就会像是等人死了才去看病。

政策钟摆的一侧是金融稳定,另一侧是寻找新的增长源头。为实现这一目的,经济必须对市场力量开放,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应当让这一点变为现实。

在上海自贸区,上海银监局通过银行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一个互动平台设立了一个“创新中心”。这一机制允许银行在与监管层充分沟通后,试验性地引入创新型产品。迄今为止,监管机构已通过这一平台放行了20个试点项目,其中包括在正常规定下不允许的跨境并购(M&A)贷款。该项目下发放的并购贷款已达400亿元人民币左右。

这一平台也鼓励针对创业型科技企业采用新的银行贷款模式。通过允许银行持有这些创业企业的认股权证或股票期权,银行可以大幅提高自身对这些公司的贷款发放能力。这一项目先在上海开展试点,2016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人们普遍认同监管和改革都是必要的,但正如中国如今所发现的,即便在最好时期,这些措施也难以实行,经济基本面恶化之时就更不必说了。上海银行业的故事只是一个地区性案例,但它可以为整个中国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范例。



在人们日益担忧中国银行业中的风险之际,上海最新银行业数据却体现出一定的弹性。上海地区的不良贷款率(NPL)连续8个月下降,至6月底降至0.79%,远远低于全国商业银行1.81%的不良率。自2016年初以来,上海不良贷款余额减少了36亿元人民币。上海地区的关注类贷款——有变为不良贷款风险的一类贷款——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占比也都有所减少。显然银行并没有通过把不良贷款隐藏在关注类贷款类别之下而操纵不良贷款数据。

上海银行业取得上述良好结果之际,中